



風險社會

——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作者／Ulrich Beck ◎譯者／汪浩 ◎序／顧忠華 ◎校訂／周桂田

國立編譯館主譯

本書為作者學術生涯的鉅製作品，當中發展出來的核心學術概念類似「風險社會」、「第二現代」、「反思的現代化」、「去邊界化」等等，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影響所及更擴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當SARS以及非典型肺炎行經亞洲擊世界經濟與社會時，作者已經在二十年前以一種未來學式，甚至文學式的語言，講述「預言」地宣告傳統現代化在面對或被逼面對社會反思之後，出現的這種「第二」現代類型。這是一種全球化邊界瓦解後，個體將全然面對風險卻不知所從的境地事實。那也是一種半調子的現代化，一種類似「回到未來」的糾結。然而這樣的副作用卻是人們所信誓旦旦追求的工業化、科學化、自由化的子彈，並且表現在所有的社會領域當中。當所有的人都是專家，幹也什麼都不是時，當所有的疆界都因工業化、自由化而瓦解卻又要求自我承擔其中些有的不確定性時，社會風險的滋生與感受就會極大化，直至全面崩潰……？



風險社會

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Risikogesellschaft

Uwe Gellert · 著 · 吳永忠 · 譯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風險社會

——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 巨流

ISBN 957-732-197-6



9 789577 321978

風險社會

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Ulrich Beck 著
汪浩 譯
周桂田 校訂
國立編譯館 主譯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中文翻譯著作財產權為國立編譯館所有

風險社會／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著；
江浩譯．-- 一版．-- 臺北市：巨流，2003（民
9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ISBN 957-732-197-6（平裝）

1. 社會變遷 2. 未來社會

541.4

92014410

風險社會 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原著：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原著者：Ulrich Beck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江浩

封面設計：李止評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 48 巷 5 號 1 樓

電話：(02) 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理：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957-732-197-6

2004 年 2 月初版一刷

定價 42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序言

顧忠華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的歷史中，每隔一段時間便有各式各樣的「先知」出現，他們以不同的形式預言著個人、社群、乃至全人類的命運，並對現實的政治、社會狀態提出警語，希望產生警惕的作用，讓可怖的預言不致一一應驗。

歷史上的先知人物，通常是披著宗教的外衣走上舞台，但是隨著世界的「解除魔咒」（M. Weber 語），科學逐漸取代了宗教與神話的部份功能，對未來的預測與控制，已成為幾乎所有科學家們——尤其自然科學家——例行工作的一環，舉凡生物科技、太空探測、資訊傳播等等領域，莫不期待新的科技發明能夠增強人類更多掌控環境變遷的能力，要「宰制世界」，而非任由自然宰制。

不過，比起人類自己製造「風險」的能力來看，數千年人類的文明進程似乎透露了另一種訊息，也就是人們自認控制能力達到高峰的時候，往往卻會帶來各種「不可測」的後果，這些後遺症包括大規模的戰爭、殘酷的種族滅絕、核子災難、生態浩劫、新型疫病等等。換句話說，在現代社會裡，「人為」的災害經常超過地震、颱風、水旱災等傳統的自然災禍，而成為威脅生命財產安全的主要「風險源」。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在這本《風險社會》中，扼要

地理論化了這樣的一個道理，指出世人對於高科技隱藏的風險不能再視而不見，必須思考有效的手段來積極回應。這個道理雖然很容易懂，只是過去大多數人看到的是科技帶來的便利與利潤，不願意真正面對想要解決此一問題時，所牽動到的複雜情境，因此各式各樣的風險損害仍層出不窮。最近由中國蔓延世界各地的 SARS 病毒，也代表了另一種環境的反撲，其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與心理衝擊，讓我們多少親身見識了風險的利害。貝克式的預言，警告人類日益陷入全球風險擴大的漩渦之中，似乎正一天天實現，乃至無法自拔。

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篇章並不是完全圍繞著「風險社會」的主題，而有近一半篇幅在討論社會不平等和階級的問題。這是因為貝克原來的研究領域比較偏重在職業社會學，另外兼及知識社會學，因此他收入本書的論文，而處理的重點也和這些「傳統」的社會學研究有關。相對於傳統研究領域，貝克最大的貢獻，則是開闢了有關「風險」的新興研究範疇，尤其他在本書第一部份的論述，已經可以被列為當代的經典。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德文原版於 1986 年出版，該年 4 月適逢蘇聯發生了車諾比核能發電廠爆炸事件，不少讀者可能認為貝克是受到這個事件的刺激，才寫出了本書。事實上，貝克是累積了他多年來對「科學知識不平等」的批判，領悟到除了「階級不平等」之外，還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風險不平等」現象，遂整理出一套理論解釋，沒想到正巧發生重大風險事件，讓他光靠書名便一舉成名。說起來，不是他趕流行，而是流行趕上了他。

貝克從不諱言，他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烏托邦成份，但是我在十年前引介貝克學說時，便特別提到：貝克在《風險社會》中舉了當時在歐洲推廣的多項計畫作為例證，說明從身邊做起的「微觀」到通盤規劃的「宏觀」的層面，人類社會都可以注入預防風

險的基本考慮。因此貝克一貫保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相信「風險社會」的來到並非代表世界末日，卻是新的機會與新的開始。畢竟社會本身具有學習能力，在歷經每次的風險事件後，多少都會反省到知識或是制度上的不足之處，希望謀求補救。貝克在另一本著作“Was ist Globalisierung?”（中譯：《全球化危機》）裡，強調「有效的風險定義」像一根「政治魔杖」，使穩居於現狀、自我滿足的社會「教導自己懼怕，並將懼怕積極化與政治化」。這樣地把自己視為「風險社會」的社會，有點類似宗教上的自我認罪，只有先承認犯了過錯，人類才有可能探索出一個與自然界和「世界良心」相互協調的較好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這本書打開了社會科學探討「風險」現象的風氣，這幾年加上紀登斯（A. Giddens）、拉許（S. Lash）等人推波助瀾，逐漸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本書中譯本的問世，應該能提供本地學者更多的靈感，共同關注已經或有可能發生在我們周遭的風險問題。譬如台灣從對抗 SARS 的經驗中，可以了解一旦發生類似風險，馬上會威脅到所有的社會成員，而「風險治理」也牽涉到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這時候，多增加一分對風險的認識，就可能少一分損失。在這個意義下，將貝克視作為「先知」，似乎不算溢美。另外可喜的是，近來國家科學委員會下設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增加了「社會經濟組」，這意味著主其事者認識到災害防治不只是自然科學的知識領域，還應該納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角度，才得以窺其全貌。《風險社會》本身並沒有泡製出「解藥」，卻不啻是在論述上校定了方向，鼓勵後來的研究者以更廣的視野來看待風險，提昇現代文明整體的反省境界，進入到「第二現代」（the second modern）。是為序。

導讀代譯序

汪 浩

一位劍橋大學教授近來出版新書《我們最後的時刻！》（*Our Final Hour!*），預測由於科學極速的進展，地球的存活率已經大大降低，遭遇毀滅性災難的機率從一百年前的 20% 飆漲到 50%，時下各種尖端科技已經演進到前所未有且佈滿危險的不可測度與失控當中。姑且不論這樣聳動的言論是否過份粗糙了，當我們審度當代若干對全球化、第三條道路、風險社會、第二現代、生活風格、個人主義化那些熱熾而幾近流行的討論，¹並對照近幾年來不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軍事等領域不斷浮現的不分國界、跨越各種部門領域的事件，尤其經歷 SARS 和美伊戰爭所展現的全球性衝擊時，我們就不能不感嘆：上述學術議題的發難者，德國當代社會學巨擘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在 1986 年就問世的經典作品《風險社會》中文版的問世似乎晚了些。

在幾乎一個世代以前，貝克嚴肅地討論並且警告當代全球化風險社會的若干特徵。如果我們偷懶地只追溯他的若干諍言，也還會突然驚覺，彷彿波柏（Karl Popper）對社會科學所下的符咒

1. 有興趣深究的讀者可以針對這些關鍵字繼續搜尋相關文獻，建議延伸閱讀讀的著作為顧忠華教授（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台北，2001。

就這麼輕易地被解除掉，而覺得社會科學好像還真的具有某種預言的魔力。貝克也強調他研究方法中的「未來」特質與一些所謂嚴謹的方法論有所區別，並且在論述上為了描繪這新興的第二現代社會的現象與型態，大量採用文學式的語言以及若干自創而艱澀的學術用語，譬如「半面化」相對於「全面化」，隱含著分歧、不足、片面、矛盾的涵義。從過去到現在，工業社會從來就不可能單純只是一個工業的社會，反而一直都是半個工業的與半個地位團體的社會，而且它地位團體的這一面並不是傳統的殘留，而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與基礎。

其他的概念如「第二次科學化」則是對應於貝克概念中對「第二現代」的社會與科學發展階段所區分的，「第二次科學化」意味著在反身性工業現代化（第二現代）中，科學發展的自我反身的問題，即科學發展過程中自我複雜、對峙、獨斷真理崩解的現象；「第一次科學化」則是相應為簡單現代化（第一現代）下，科學為工業實踐所服務，宣稱啟蒙真理決定社會為唯一的獨斷真理，缺乏自省批判，即「簡單的科學化」。在第二現代的反身性過程中，科學和實踐在科學依賴的條件下，各自分道揚鑣了。實踐應用的那方面會開始越來越透過科學來與科學劃清界線，而出現疏離的現象。弔詭的是，這並不是因為科學的無能或是低度發展，它反倒是科學極度發展後的分化、過度複雜化、自我批判和反身的產物。周桂田認為 *Reflexivität* 譯為反身性的原因在於，貝克強調工業（現代）社會所發展的工業化、現代化會與其自我相衝撞，而形成許許多多的災難和風險，因此那是工業社會自己所遭惹的，自己所赤裸裸要面對解決的問題。工業社會即風險社會也就在此。換言之，這是「面臨」、「對峙」的問題。

貝克這種綜合著未來學式的、規範性的、文學批判性的論述

方法也就不免要衝擊到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風險社會的形成與其中存在的不確定性恰恰就是因為吾人社會規範性的思考不斷在當中流失，讓一些學術的終極關懷：像人是什麼？我們如何能關懷我們的大自然？等等的問題蒙蔽在數學公式與方法爭執的魔障裡。當一切要由嚴苛的機率的可能性來行動或管理，讓我們連「否認」都過分草率了。總地來說，貝克認為當代社會在追求某種確定性也因此發展到此理性時代的極致時，卻反轉弔詭地被推向另一個極端：越發不確定的「另一種現代」，在這種不確定性風險社會中，沒有嚴格的倖存者，因為那起源於一種全球性隨處可能席捲而來的危險，而那些危險也將（已經？！）被全球化。危險會因為不確定、無邊界、無法捉摸而四處留連，粉飾只會橫生恐懼下的鎮靜，而越發升級，它的攻擊性也就更加囂張。當事物的可認知性失去了，就不會因為不實現而瓦解，反而甚至會提高其危險實現的程度。

從社會學傳統有關社會階層化和社會不平等的角度來看，第二現代風險的分配，因為風險的跨階層性，也就和傳統第一現代的分配形式不同，換言之，那和個人資源的分配與階級地位（Karl Marx）或甚至和個人所身處的組織條件與文化環境（Max Weber）無關，許多人或許會企圖在這種無可捉摸的風險中累積資源，就像那些幼稚地將 SARS 片面而短視地歸咎給某種屬性的人並試圖藉機堆砌政治資源，或者那些在美伊戰爭中，因為嬰幼兒的肉身盾牌而間接大發利市的商人。最終也將因為缺乏集體的反思而反噬自身。

因此，與現代對照下，風險社會中的「弔詭」也就不足為奇，因為如果從當中一個核心概念——去疆界化——來省思：不論這裡的疆界是組織、家庭、政治、經濟或地理疆界，從哪裡移

轉而來的理性利潤越多，我們就越會因為經營這不確定性而取得的好處，在未來付出代價，當進步的文明把潘朵拉的盒子揭開卻無法回答其中的奧秘時，一切都沒有了禁忌，一切也都可以被接觸，一切也因此變得不確定。當過去能保護自己的疆界逐漸消失時，每一個人都可能從中獲利，然而每一個人也都因此而更暴露在風險當中，成了新的「個人主義化」。「風險」也就是和那些預測的、尚未成形但卻有破壞性威脅的東西有關，無論如何就這一點意義來看，它就已經是赤裸裸的了。

「侏儸紀公園」的風險並非起源於恐龍的獸性，而恰恰就是誕生於人的理性和理性化過程，或者更精準的說——人類自我詮釋而認定的理性。或許風險社會中的理性計算已經因為過多的不確定性而失效，也因此 SARS 防疫措施錙銖必較的「正常」評估模式，就襲染上那麼一點點慢郎中的無奈與悲涼。

然而是否我們的「進步」、「富足」、「經濟成長」、「科學理性」等觀念還是可行的？從這層意義來看，這裡的弔詭就出於我們正進行一種現代化正確路線文明信仰的爭鬥，而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科學發展最終也只是一些選擇。這就比較像中古時期的宗教信仰衝突，而比較不像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階級衝突。如此，貝克對風險社會的理解是跨學科、跨部門的。站在歷史社會學的縱斷面上，他嘗試以風險概念來超越歷史變遷的階級式或階層式的思考範疇，風險的分配具有一種文明的先賦屬性，弔詭的是這樣的屬性是過去從來不曾出現的，也因此贏得了一種未來學的意義，其中鑲嵌了許許多多中古式的信仰迷思，讓理性的光芒消失殆盡。而且不論就馬克思學或韋伯學來說，這都比較不是時間上的，而是理論上的超越，換言之，風險社會中存在的許許多多前工業或前現代的文化遺留，會在依舊解咒的氛圍中被

重新鑄造而形成所謂的「第二現代」。

因此，風險社會讓許許多多過去的社會標準都變得有些荒謬。對此，貝克是有著相當嚴苛的批判的，他將過去的勞動分工比喻為「普遍的共犯結構」、「普遍的不負責任」，甚至認定這種以理性化作為合法性的潛在性基礎，是某種以全人類以及全大自然為犧牲的特權型式。然而在風險一般化的過程中，「兇手」終究會和「受害者」變成同一個人。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風險也變成了一種可以操縱、可以不斷推陳出新的、無法滿足的商品，各種供應商也包含學術界不斷推出「規避風險」的特效藥，消費者則享受「安全」的需求，但是卻沒有一方能提出售後「保證」。對風險市場的操縱當然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買到「檸檬車」的危險也就永遠不可避免，相對於傳統市場中為滿足飢餓而提供糧食，在風險社會中便是對市場資訊的詮釋，以便「滿足」安全的需求。換言之如何能將各種風險資訊給「詮釋掉」。

當一切疆界都模糊甚至瓦解了，個人將要直接向市場挑戰、自我承擔責任，不得不隨時準備好自己為自己的失業或貧窮合理化，跨階層的大量失業會被推卸為人們自己的命運。不再是社會的集體命運，而是個人生涯時期當中的特殊遭遇。因為階級與地位的共生特殊性會在個人化的普遍化過程中逐漸瓦解，「新貧窮」也就不但是一種物質問題，還是一種貧窮意識、一種階級意識消亡後全盤緘默與內化接受的過程。貝克將這種個人主義化的現象鑲嵌在市場結構中，然而那不是指第一現代中個體重新誕生，而在建構成的世界中自我創造的開始。它比較是一種朝向個人生活世界制度化和標準化的新趨勢。個人主義化成了因為市場依賴、制度依賴、教育依賴所導致的結果，也就是個人主義化的制度

化。這指出了個人主義化這種固有的內在矛盾是現代化半面化的現象，恰恰使得個人的自立自主越發困難。即使失業因為兼職化或低度就業化而消失，但是第二現代下這種「個人主義化制度化」的勞動政策也就變成一種分配政策，而繼續創造新的貧窮和不平等。

這樣的過程與科學和技術的宰制脫離不了關係，科學過度的專業化造成了單項學科的對內封閉、對外傲慢，而無能對風險作即時全面的回應。過去「不平等」社會的價值系統，如今變成「不安全」社會的價值系統。追求平等的烏托邦隱含追求一種正向的目標，追求安全的烏托邦則是負向被動與防禦的。因為科學在認知、擷取、處理風險上已經高度制度化了，制度外部因素所常常造成的失控也就屢見不鮮，甚至稀鬆平常。

也因為一切都變得不確定，沒有了邊界，也就帶著風險，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也就更無法控制，社會各層面（民族國家、經濟發展、兩性關係、婚姻家庭、學校教育、政治制度、司法判決、科學技術、社會運動、醫療行為、企業組織、新聞傳播、軍事活動等等）出現的現象也就標誌出這第二現代的特徵：

民族國家的邊界會和一些聯盟體系或經濟體系的邊界一樣，慢慢解消掉。如果說階級社會可以用民族國家的型態來組成，那麼因為風險社會起源於一種「危險共同性」，它也就只能在世界社會這麼大的框架中來承接。因為太多的不確定，新聞媒體反倒變成風險的傳播者，讓風險無處不再。婦女在第二現代的傳統「後備軍」性格呈現了現代半面化的兩性關係側面。雖然人們覺得私領域圍牆內院裡的諸般關係不必然就要沿著婚姻與家庭、男性與女性角色這樣的傳統模式演出，然而在第二現代中，去傳統化卻與傳統化有一種新的組合關係。從這一層意義來看，「資本

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就比較不是一種自發的東西，而比較類似一種「晚期地位社會」的文化。半面化也就是這種現代化倒退又與傳統重新鑄造的過程，一種無法全面解咒的過程，或是現代化H的理性的脫軌、矛盾，而呈現半調子的現象。

第二現代教育擴張的結果也出現類似的性格，教育專利貶值和增值的雙重性與矛盾性，讓傳統地位與社會關係又更加重要。學校作為一種制度性的設計，失去了他現代社會的職業功能，成了一種託管單位，不再能夠去滿足屬於它實現職業資格的任務，也失去經由它而能向未來遠眺的職業意義與線索。

在組織上，現代資訊科技使得未來「企業」資訊流的運作改變了組織的結構，模糊了組織的界線，資訊也就成了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元兇，如此，資訊的擁有與否、傳遞方式、路徑過程也就成了組織間折衝尊俎、互爭雄長的重要權力和衝突來源。因為不安全感以及風險，企業對彈性的興趣會與日俱增，因此傳統現代標準化大量生產的組織性先決條件也就不再適用。

科學和教育一樣，越來越必要，但越來越不充分。因為必要，科學變成新的禁忌，因為不充分，各種知識「山頭」都有其自我定義、自我宣稱的有效性，各種社會次系統在專門性和可壟斷性的模式中，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現代和反現代，也就帶著矛盾性相互融合在一起，耗費巨資與規模龐大的科學研究，往往要到電視或是報紙報導過後，才會受到其委託機關真正關注的眼神。而往往政治也最多只能專業到要對各方「信任」，並追認其後果而加以合法化。第二現代的矛盾就出在，延續過去科技與發展邏輯的再工業化策略在「時過境遷」又缺乏反思的情況下保留了下來，而造成了對風險和機會的誤判。

第二現代這種去核心操控的事實卻不是通往社會虛無的單行

道。對貝克來說要澄清這渾沌的、「什麼都是卻又什麼都不是」的第二現代道路，要依靠各種相互控制的新中間型態，那是一種公民社會多元勢力共同操控社會變遷的型態，如果人們把政治界限消失這樣的基本事實情況當作核心議題來看的話，它們就有實驗性民主型態的意義，這種公民社會多元勢力的彈性化原則在已經出現的風險與不確定處境下，會逐漸贏得比較優先的意義。同時還要透過制度設計，對次政治各種特定批判可能性在法律上加以確保，逐漸化解當中的矛盾，釐清不確定性，對抗各種資訊、科技專業和企業經營的宰制而打出一條活路，讓外界清楚理解並且可以評判，到底我們正在實驗什麼樣的未來。雖然本書最終貝克還是無法提出具體的制度設計建議，文間也出現若干矛盾之處，但無論如何，對於這一部洞燭機先的巨著，我們還是不能不在「現在」折服於他「過去」時所提出那般鞭闢入裡的「未來」洞見。

對於這本經典中文版的延遲問世，國內翻譯環境固然是原因之一，我則要負大部份責任。巨流圖書出版公司的陳巨擘總編輯對我的「信任」，最終還是無法提升我的「績效」，我的能力是障礙之一，原作者廣博的知識，以及書中信手拾來的妙句、隱關、古文、方言、自然科學專業術語等等，都在無法預期的情況下，讓進度一再延宕，而且居然就這麼過了三年，我錙銖必較的毛病在追索原作者的思路成了共犯。至於我能力不足所導致的部分謬誤，所幸有周桂田教授不厭其煩的校訂補正，對於當中讓人靈光乍現的解釋，我只能摻雜學習的心情向他說聲謝謝。國內相關學者如我的老師顧忠華教授的研究著作，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國立編譯館的匿名審稿意見也給了我相當的啟發。然而這些卻不能是我對書中可能出現錯誤而卸責的理由。要感謝的人還包括東海

大學哲學系的許尹瑄同學，逢甲大學工學院那位在網路裡匿名提供我自然科學專業意見的同事、我的德國友人 Michael Teller、德國波昂大學的成世光先生以及他的夫人 Claudia 以及接受我的驚鈍的陳巨擘總編輯，當然，「無法免俗」一再對我忍氣吞聲還得協助校稿的內人——屏東師範學院陳希茹助理教授是最大的「受害者」。

學術性翻譯環境在台灣當前的學術文化下的確相當困難，也因此當陳總編輯告知本書已獲國立編譯館支持時，便有如釋重負甚至脫罪的感覺，然反覆思索當前世界人類在全球化下的處境，如此艱困的學術翻譯環境就不免帶著那麼一點點諷刺。貝克猛烈敲擊的警鐘並不會因為 SARS 這樣單一全球性事件的褪卻而消聲。因為由人類建構並且持續在生活世界中強化的風險社會，已經成熟到將會陸陸續續透過各種不同管道，化身林林總總的樣態，不斷地對全人類造成衝擊。弔詭的是——回到貝克——這樣具有高度規範性甚至臆測性的呼喊，似乎並沒有符合所謂「嚴謹的」科學要求，還好沒有！

逢甲大學，2003/11/20

緣起

對一個逐漸瀕臨險境的文明而言，它在所有的意見場域中所充分呈現出來的恐怖意像，真是無以復加。又一波束手無策的宣告同樣引不起關注，在這過程當中，工業主義本身依舊嚴格遵從的這種與「神聖」世界相對立的二分法¹，已經失去了它所曾經擁有的意義。這本書所要處理的便是「第二」步，也就是這接下來要走的下一步。亦即把日前這種狀態當作對象，提上檯面來加以解釋，問題是，如何去掌握這種時代精神的不安定感，如何以意識型態批判式的來加以駁斥，如何尖銳地以社會學傳達和啟示的方式去理解這種想法。理論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建立的主導理念，頂多能在一種歷史的類比中加以說明：就好像十九世紀時，現代化把身分等級僵化了的農業社會解消了，並且把工業社會的結構圖像從中剝離出來，今天，現代化卻將這工業社會的輪廓解消，並在這現代連續體中建立另一個社會型態。

烏爾利希·貝克是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Sozialen Welt 的責任發行人。

Suhrkamp 版本 1468 號出版他的《解藥，組織化的不負責任》（1988）。他和伊莉莎白·貝克-葛楊絲海一起寫成：「愛情那十

1. 譯者按：指工業現代與非工業世界。